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3

张岱

夏咸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73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亭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3

张岱

夏咸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岱/夏咸淳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2028-2

I. 张… II. 夏… III. ①张岱 (1597~约 1689) — 文学评论②古典文学 — 文学评论 — 中国 — 明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11 号

张 岱

夏咸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6 千字 印张: 2 1/4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028-2/1·1766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夏咸淳 1938年生。

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达二十年。1981年招聘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现为研究员、室主任，兼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古典散文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论著有《明末奇才——张岱》，《晚明士风与文学》，校点评注古籍有《张岱诗文集》、《张岱散文选集》、《明六十家小品》、《明清山水园林记选》（《明清闲情小品》之二）。

一、家世与生平

明清之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是一个群星辉耀巨匠荟萃的时代。诸多文化大师的那种峻洁坚卓的人格，渊博高深的学识，宏富伟丽的著述，在今天依然光彩熠熠，令后世景仰赞叹不已。

在明清之际文化大师的行列中，巍然屹立着徐光启、徐弘祖、宋应星、朱载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傅山等等。具大节义、大学问、大手笔的张岱，也是其中之一人。

张岱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蝶庵、天孙、六休，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所以张岱常常自称“蜀人”，又署“古剑”（绵竹古属剑州）。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年诸说不一，商盘《越风》有张岱小传，谓其享年九十三岁，据此推算，则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张岱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顺治三年（1646）清兵攻陷绍兴为分界线，张岱时年五十。其前半生，仰承祖上余荫，过着膏粱子弟的舒适生活；其后半生，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终以布衣遗民

陶菴張長公小像



张岱画像 宁波天一阁藏

歿世。社会的沧桑巨变，身世的贫富贵贱的巨大落差，对造就这位奇才起了很大作用。

张岱出身“累世通显”的望族。高祖张天复，字复亨，号内山，别署镜波钓叟。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礼部主事，历官云南按察副使，迁甘肃行太仆卿。曾祖张元忭，字子荃，号阳和。隆庆五年（1571）状元，授修撰，升翰林侍读。祖父张汝霖，字肃之，号雨若，又号斫园居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清江令，调广昌，迁兵部主事，历任鲁黔桂三省副使、参议等职。其父张耀芳，字尔弢，号大涤，屡困场屋，五十多岁才以副榜贡生授鲁王长史。张氏家族传到张耀芳这一代已现衰败之象，耀芳自小就刻苦钻研八股，“沉埋帖括四十余年”，但屡试屡败，连个举人都未考上，最后只好屈就胥吏小职。他又“不事生计”，大手大脚，花钱如水，到晚年“身无长物”，“繁华富丽，过眼皆空”（《琅嬛文集·家传》）。于是重振家声、再光门楣的希望便落到了张岱这个嫡长子的身上。

张岱的高曾祖三代先辈都很有学问，是著名学者，尤其长于史学和地学。高祖张天复著有《湖广通志》、《广輿图考》。曾祖张元忭著有《皇明大政记》、《云门志略》、《馆阁漫录》、《读史肤评》。元忭还是隆、万间理学家，推尊阳明心学，笃信良知之说，又惩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不务实学的弊病，力倡践履躬行。尝云：“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务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简易愈广大。”

(《国朝名公尺牍类选·复许敬庵》)张氏聚书丰富,集三万余卷。张岱少时将经其高曾祖手批之书计二千余卷汇集起来,请祖父转让给他收藏,其祖欣慰地说:“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陶庵梦忆·三世藏书》)

张岱先辈高曾祖父四代人,都爱好文艺,能诗善文,可谓文学世家。张天复有诗文集《鸣玉堂稿》。元忬有《不二斋文选》,李贽评其文“春容尔雅,粹然一出于正”(《续藏书·理学名臣》)。屠隆评道:“文章巨公,片语南金,四海共宝。”(《白榆集·与张阳和太史》)其为时人推崇备至。张汝霖有《劄园文集》,又精音律,通戏曲,居家常以丝竹自娱。张耀芳成就不如其父祖,但也“善诗歌,声出金石”(《家传》)。张家自张汝霖而下,三代人皆好戏曲声伎,家蓄戏班,有“可餐班”、“武林班”、“梯仙班”、“吴郡班”、“茂苑班”、“苏小小班”诸名目,“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僮童技艺亦愈出愈奇”(《陶庵梦忆·张氏声伎》)。张氏自高祖张天复起,就开始建造私家园林,以后代有兴造,有劄园、天镜园、表胜庵、不二斋、众香国、漱花阁、悬杪亭、筠芝亭、镜波馆、苍霞谷、万玉山房、南华山房诸胜,另外在杭州西湖还购置寄园。张家又喜收藏古董珍玩,张岱叔父张联芳,字尔葆,是江南一大收藏家,与嘉兴项元汴齐名。联芳又精绘画,与董其昌、李流芳等并称于时,其婿即大画家陈洪绶,自幼从其习画,得其衣钵,洪绶与张岱是知交。张岱还有一位

叔父叫烨芳，也富才艺，“海内诸名士，无不倾倒”，死之日，上门吊唁者，有郑孔肩、吴伯霖、闻子将、严印持、黄元辰、李长蘅、陈明卿、文文起、陈古白、缪当时、方孟旋、艾千子、陈大士、罗文止、丘毛伯、章大力、韩求仲、宋比玉、萧伯玉、万茂先(《琅嬛文集·附传》)，都是文坛名流。张岱是目睹了这一盛况的。在这样一种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环境中，很容易孕育出多才多艺的文学巨匠。

张岱在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熏陶下，幼年即显露出文学天才，他六岁能即席作对，敏捷奇巧。他在《快园道古·夙慧部》中自述幼年三事：

陶庵六岁，舅氏陶虎溪指壁上画曰：“画里仙桃摘不下。”陶庵曰：“笔中花朵梦将来。”虎溪曰：“是子为今之江淹。”

陶庵六岁，在渭阳家，一客见缸中荷花出，出对曰：“荷叶如盘难贮水。”陶庵对曰：“榴花似火不生烟。”

陶庵年八岁，大父携之至西湖。眉公(大名士陈继儒)客于钱塘，出入跨一角鹿。一日，向大父曰：“文孙善属对，吾面考之。”指纸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陶庵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赞叹，摩子顶曰：“那得灵敏至此，吾小友也！”

张氏家族对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寄予极大的希望，勉励他不断上进，将来能建“千秋之业”，像祖辈那样博取功名富贵，光大张家已现衰飒的门户。少年时代的张岱颇汲汲于功名，自言“功名志急”，欲“一鸣惊人”，不甘于“轩翥樊笼”，“局促辕下”。这些志愿在十六岁写的《祁梦疏》中已表露无遗。

张岱前半生正值明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万历中期，张居正厉行改革，变法图强，明室一度出现振兴气象，史称“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明史》卷二一三）。但好景不长，到万历后期，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各种积弊及天灾同时迸发，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以万历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纵欲挥霍，矿使税使四出虐民，土木兴造耗费无算，又频年用兵，不断增加赋税，导致“民力殫残”，“竭膏血不足供应”。天启年间，政治大坏，宦官魏忠贤专权，大肆杀戮正直大臣，明朝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张岱在《石匱书·熹宗本纪》中评道：“天启则病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背，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预感到明朝统治有如将倾之大厦，风雨中之破舟，将发生“天崩地坼”的大灾难。满腔热血的志士仁人对衰败的国势深表忧危，热望献身报国，救亡图存。青年时期的张岱也冀望为国家效力，有志于挽救危亡，他曾作文以明志：“张子志在补天。”（《琅嬛文集·越山五侠记》）

和明代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的人生道路一样，张岱要实现“补天”济时和光宗耀祖的志向，不得不到狭隘的科场仕途上竞争一番，不得不研习他所厌恶的八股制义。他和他父亲一样，对“举业”曾下过苦功，《砚云甲编·陶庵梦忆序》说他“少工帖括”，张岱自己也说，“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邨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琅嬛文集·祭周戡伯文》）。但是衡文标准难有定则，八股文更是如此，这杆秤完全操在考官手中，遇上不识货的考官，文章再好也只当废纸。一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但平庸糊涂的考官比比皆是，而嶷崎磊落之士出手往往越出常套，也往往不中式而落选。张岱的命运正是这样，多次应考都败落了，到头来依然是一个可怜的“诸生”。崇祯间，同乡知交曾任苏松巡抚的祁彪佳闲居在家，曾向地方官李清竭诚推荐张岱，称其“淹贯经史，博极群书，旁及诗歌古文”，希望能拔识于“坎坷偃蹇”之中（《祁彪佳文稿·都门入里尺牍》），但也无济于事。张岱本来就鄙视举业这玩艺，其祖父曾教导子孙“惟读古书，不看时艺”（《家传》），又秉性耿直，不肯去找门路，“求一郡邑有司为之先容”，“惟是窜迹深山，闭门诵读”（《都门入里尺牍·与李映碧公祖》），渐渐对竞争科场仕途心灰意懒了。

张岱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八股制艺、科举制度的腐朽性和危害性，而予以深刻、猛烈的批判，指出：“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

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八股文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极深,钻到这套子里出不来,只能成为思想卑下、学识庸陋、行为委琐的可怜虫。这东西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举子应试,原无大抱负,止以咕哔之学迎合主司,即有大经济、大学问之人,每科之中不无一二,而其余入彀之辈,非日暮途穷、奄奄待尽之辈,则书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济世利民,安邦定国,则亦奚赖焉?”张岱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初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目的在于软化、笼络广大士子,“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也”。但是所取之士多为无能之辈,而将大批杰出人才弃置不用,结果受害的不止是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明王朝自身也遭严厉惩罚,终于灭亡,“则高皇帝(明太祖)之误人尤小,其所自误则甚大矣!嗟嗟,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大批才智之士受科举制度压抑而不获展其志,“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他痛切感到腐朽的科举制度是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罪恶根源之一。他牢骚多了,愤愤不平,发为文章则触及时弊,《蛾眉山》一文借题发挥,感慨道:“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还写过一出《乔坐衙》杂剧,矛头直指宰相,内含“讥刺当局之语”。他常为穷愁潦倒的“寒士”鸣不平,代他们宣泄胸中的怨愤。《公祭张亦寓文》云:“盖亦寓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

贫病相寻，赍之以老。其胸中真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巨鱼失水、老骥伏枥之悲，不能如祢衡之挝鼓，灌夫之骂座，范亚父之撞破玉斗，曹孟德之击碎唾壶，徒厄塞终身，胸怀莫吐，以致磊块郁结，安得不昏昏闷闷、鲠咽以死也！”

张耀芳沉埋帖括四十余年，大半辈子的时光与精力都耗在这无用之物上面，结果一事无成。张岱醒悟早，没有像他父亲那样迷恋八股，在铢羽之后，不再醉心于此，而把兴趣集中于学问和文艺。做这样的选择，须有胆识和勇气，要能淡于功名富贵，挣脱光宗耀祖传统观念的牵掣。于功名、学术二端，张岱还是选择了后者。这一人生抉择与家学渊源有关。如前所述，张氏不但是世宦之家，而且是学者之家、文学之家。高曾祖三代人都是知名学者，家有治史的传统。祖辈、父辈既希望张岱取得功名，延续荣显，也希望他继承家学，有重大著述。祖父张汝霖似乎更看重后者，特别嘉许长孙“好书”。张岱青年时代就立下修史的志向，实与家学有关，他说：“余家自太仆公（指张元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余乘，亦且荡为冷烟，鞠为茂草矣。”（《石匱书自序》）又说：“自幸吾先太史（亦指张元忬）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征修明史檄》）汉代司马谈父子和班彪父子都有世代修史的传统，张岱也决心禀承先人的遗志，修纂一部明史。这是家学渊源所致，也是由

于时代文化历史使命的推动。因为明代垂统二百余年,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明史,所积史料甚多,但毛病也多,“国史失诬,家史失误,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匱书自序》)。当时许多学者都有志于修史,编纂一部大型明史。而浙东学术在史学方面根基尤其深厚,明季黄宗羲、万斯同、查继佐、谈迁等皆有大著作。风气相煽,时代需要,也促使张岱轻功名而重述作,以修史自任。

明代中叶以还,游风盛炽,士大夫都好游览名山大川。张岱也不例外,白云:“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西湖梦寻·大佛院诗》)所至名山有山东泰山、浙江普陀、安徽齐云、湖北武当等,而吴越山水游历殆遍。对故乡山阴道上山水更是了如指掌,又长期在杭州西湖盘桓,于湖中景物掌故知之独详。友人王雨谦说:“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西湖梦寻序》)因此张岱能识得山水性情,赏其幽美,所作山水小记蕴含“空灵晶映”之气。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城市与集镇也日益繁盛,吴越地区新兴城市如星罗棋布,尤其繁华。像张岱经常逗留的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等名都大邑,乃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市民阶层最集中的

地区。在这些地方,张岱领略了斑斓绚丽的城市风情,结识了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吸收了新鲜活泼的市民思想和人文精神。在张岱结交的市民朋友中,关系最密切的是民间艺人。他抛弃了鄙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鄙视工匠艺人的传统观念,而以新的价值观念看待市井“小民”,认为那些身怀绝技的工匠和技师、伶人和曲艺家,那些治玉、治犀、治金银、治竹、治窑、治漆、治扇、治灯、治琴者,都是值得称道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掌握了高超的技艺,还因为他们所制作的工艺品和表演才能体现了美和艺术的规律(即所谓“道”),“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这些艺人是真正的艺术家,不可小视。张岱称赞竹刻家濮仲谦“雕刻妙天下”,“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琅嬛文集·鸡柴奇觚记序》)。又称赞浙江海宁民间微雕艺人王二公“镂剔须弥属鬼工”,“剡刀更胜黄筌笔”,在他眼里,这位民间艺人的技艺当在五代著名宫廷画师黄筌之上。张岱对评书艺人柳敬亭更是推崇之至,谓其刻画人物出神入化的手段可与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匹敌,“眼前活现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张子诗钞·柳麻子说书》)。有史以来,还没有人像张岱那样把一位民间说书先生同史学巨匠司马迁相提并论的。惟有把民间艺人当作真正的朋友,识得民间艺术真正价值的人,才会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张岱深受市民文化的熏陶,从市民生活

中汲取了丰厚的养料，他的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记带有蓬勃向上的市井气和人情味。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不久清军大举入关，占领北京，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新的统治者。这是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大转折，在天崩地裂、沧海横流、血与火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士大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张岱一家也由一个世家大族沦落为普通民户，他由一个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纨绔子弟转眼之间成了衣食无继的贫苦遗民。

清兵占领北京和中原以后，继续南下，但遭到江南军民的顽强抵抗，顺治二年(1645)，清兵横渡大江，南京沦陷，组建不到一年的福王弘光小朝廷即告覆亡。是年六月，清兵又陷杭州，直逼浙东绍兴等地。这时祸国殃民的弘光朝奸相马士英率残兵逃窜到浙东，打算投靠台州的鲁王朱以海，企图东山再起，但遭到鲁王诸多臣下的反对，对这个十恶不赦的权奸，广大吏民无不切齿。张岱也激于义愤，以“东海布衣”的名号上书鲁王请求立斩“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以谢天下，并自告奋勇假“一旅之师”追杀马士英。上疏获准，即带兵数百人追击，马士英宵遁钱塘江，去见私党方国安。方是总兵，握有兵权，反而挟持鲁王斥逐张岱。这件事表现了张岱的爱国热情和凛然正气，同时也反映了南明小朝廷的腐败。不久鲁王监国由台州转移到绍兴，因张岱之父曾为鲁先王长史，与鲁王有旧

谊，张家又是绍兴巨族，朱以海亲临张府，并授张岱职方主事之官。张岱察觉以海并非大有为之主，扶他上台的一些将领也都包藏祸心，拥兵自重，这个脆弱的小朝廷与弘光政权同样没有希望，又目击“时事日非”，便没有接受这一职务，在绍兴嵊县山中隐蔽起来。握持兵权的方国安命人持币强邀张岱出山，“商榷军务”，并派“县官上门敦促”。顺治三年（1646）正月，张岱不得已而出山，途中“疽发于背，痛楚呻吟”，睡梦中见到以身殉节的好友祁彪佳，彪佳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天下事至此，已不可为已”，劝他速速回山，“完《石匱书》”。次日，回到山中，才逾十日，便有官兵上门征税逼饷，并绑架了他的一个儿子。张岱回想起梦中见到“大小星堕落如雨”的天象，听到祁彪佳“天数如此，奈何奈何”的叹声（《陶庵梦忆·祁世培》），对南明小朝廷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梦反映了平日张岱对局势的思考，对自己出处的选择。他热望尽忠报国，但国已不国，“志欲补天，而天如玕璣，炼石在手，则亦奚益哉？”（《石匱书后集》卷五十三）遂托病在家，未赴国安之召。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岱所料，这年六月，鲁监国政权在清兵攻击下，一触即溃，鲁王逃到海岛上去了。绍兴沦陷，国破与家亡的厄运同时降到张岱头上，他陷于极度悲痛之中，“悠悠忽忽”，“每欲引决”，他想效法亲友和节士们的义烈之举，以一死尽忠明室，保持坚贞的气节。但想到自己未